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

• 中 册 •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印发

一九六五年九月

說 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系捷共党史研究所、捷共高級党校党史教研室和捷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研究所合著。

根据布拉格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譯出。

目 录

第六章	捷共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摆脱危机的群众斗争的前列(1929—1938年).....	1
一、	世界经济危机。危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影响,劳动大众的处境.....	1
二、	捷共在坚决面向群众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极端左倾倾向的克服和反对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1 1
三、	捷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党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	2 2
四、	捷共站在工人、失业者和小农的群众斗争的前列。莫斯特的罢工!.....	3 8
第七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保卫民主、保卫共和国、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1933—1938年).....	5 8
一、	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对遭受法西斯进攻威胁的各国人民的帮助.....	5 8
二、	紧急独裁制度和使捷克斯洛伐克法西斯化的企图。对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进攻.....	6 6
三、	战斗的社会主义联盟口号。打退法西斯主义的进攻.....	7 4
四、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其历史意义。法西斯和反动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阴谋。捷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保卫民主、保卫共和国、反对希特勒侵略的路线.....	8 8

五	民族問題和保卫共和国。经济斗争的加强。統一战綫和人民陣綫运动的巨大发展.....	104
六	納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人民群众奋起保卫共和国。共产党反对慕尼黑的投降.....	122
第八章	捷共站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1938—1945年).....	142
一	慕尼黑协定的后果。捷共轉入地下和它的路綫。希特勒德国奴役捷克斯洛伐克.....	142
二	希特勒佔領捷克地区与斯洛伐克的納粹統治。捷共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路綫.....	151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党在1940—1941年間的工作.....	164
四	苏联偉大的卫国战争。反抗运动的高漲。捷共领导作用的加强.....	183
五	战争发展中的轉折。党努力开展武装斗争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捷苏条約。捷共为奠定人民民主基础而斗争.....	205
六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苏軍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民族陣綫政府的科息斯綱領。民族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224

第 六 章

捷共站在无产阶级争取 摆脱危机的群众斗争的前列 (1929—1933 年)

☆

☆

☆

一、世界经济危机。危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 影响，劳动大众的处境

1929年10月4日，紐約交易所股票行情的暴跌宣告了繁荣时期的結束和经济危机的来临。某些国家在紐約的“苦难的星期五”之前就出现了危机。到1929年末和1930年，危机便籠罩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事实表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完全正确的結論，当时大会断定，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和暂时繁荣即将結束。历史的发展粉碎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及理論家关于所謂“永久的繁荣”和“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等等之类的神話。危机在资产阶级和右派社会党的理論家中間引起了极度的混乱。他們对经济危机的原因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釋，虛构出形形色色的理論，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中合乎規律的一个組成部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佔有之間的矛盾是爆发危机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和目的不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是利潤。追求利潤的欲望驅使资本家

不断地扩大生产。但是，繁荣时期的生产发展是与增长速度比生产来得缓慢、甚至有所下降的基本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相适应的。一方面市場上大量商品找不到买主，成批地堆积在商店和仓库里，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人民却連购买最必需的生活日用品的钱都不夠。劳动人民沒有生活資料，因为这些生活資料他們生产得太多了。因此，繁荣时期便合乎規律地为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机所代替。但是，这并不是由于生产超过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完全是由于生产发展超过购买力的需求而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三十年代初期的危机，是資本主义到那时为止所曾经历的一次最深刻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它蔓延到所有資本主义国家，遍及所有的工业部門，並且同严重的农业危机交織在一起，財政危机也隨之而降临了。它是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它的深刻程度、破坏作用和延續性異常之大。資本主义的壟断性质及其总危机增加了克服經濟危机的困难。壟断組織人为地維持着高价，市場购买力的恢复要比資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緩慢。到1932年資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即低于1913年的水平。国际贸易額縮減到最低限度。当千百万失业者（据估計当时整个資本主义世界里的失业人口达三千——四千万）飢寒交迫地徘徊在街头的时候，壟断資本家为了維持高价毁灭和糟踏了貯存的谷物和食品。千百万农民和小生产者陷于破产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沒有发生經濟危机，这就是苏联。当資本主义世界在經濟危机中癱瘓掙扎的时候，苏联人民正順利地执行着第一个五年計劃，經歷着經濟和文化巨大高涨的时期。第一个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了。苏联的工业生产比战前增加了两倍半，这就彻底粉碎了資产階級和社会民主党所宣揚的苏联計劃不可能實現的謊騙性預言。

在工业迅速增长的同时，苏联的农村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农民基本群众从落后的小生产经济走上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道路。富农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出现了强大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资本主义国家中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高涨之间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向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同情日益增长起来。

苏联的成就激起了国际反动派的疯狂仇视，他们策动了一系列的反苏运动。罗马教皇甚至还宣布举行反苏“十字军”祈祷。在1930年5月危机刚爆发不久，法国就首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苏活动。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拟订了一个由欧洲二十七个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联邦的所谓“泛欧洲”计划。这个计划的组织者声称，“泛欧洲计划”的目的是准备废除关税并采取其他经济措施，以便能顺利地克服危机引起的困难。实际上“泛欧洲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欧洲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反对苏联。但是，由于遭到担心法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会因此加强的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外交界的反对，“泛欧洲计划”破产了。

在经济危机期间，德国在世界反动派的反苏计划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加紧了执行了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外国资本在德国的投资已达二百五十亿马克。1929年上半年德国的赔款额减少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一些其他限制也废除了。1930年，即在条约规定期限的前五年，西方占领军队就全部撤出了莱因区。1931年德国便完全停止支付赔款。在希特勒上台的前一个月，即在1932年5月，德国获得了“在适用于各国的安全体系范围内进行武装的平等权利”。一直在暗地武装的德国，现在

就能更为公开地准备战争了。

由于危机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間爭奪銷售市場和划分資本輸出範圍的競爭也尖銳化起来。帝国主义之間矛盾的尖銳化首先反映在凡尔賽和約体系的危机上。在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要求修改凡尔賽和約的呼声日高，但另一方面，从凡尔賽体系中获得好处的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則坚决反对这种修改和約的企图。双方都在箭拔弩張地互相威胁。

新的世界大战的第一个策源地出現在远东。1931年9月日本軍隊侵占了中国的东北。这样，日本便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世界战后秩序的国家。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所持的縱容态度，也鼓励了德国軍国主义。

随着德国地位的增强，捷克斯洛伐克地位就相应地削弱了。“小协商国”日益解体。1929年当德国賠款額減少、奥地利賠款全部勾銷的时候，西方列强却肯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有义务支付三十亿克朗的“解放費”，此外，由于承担奥匈帝国遺留下来的債務、偿还維持和运送捷克軍团所欠的費用还須支付几十亿克朗，这就是貝奈斯长期以来为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地效劳而得到的报酬。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政治地位的处境不佳，但它作为法国集团的一个成員仍参与了全部反苏阴谋活动。由貝奈斯掌管外交政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頑固地拒絕在法律上承認苏联。1930年貝奈斯的付总理克·克罗夫塔声称，苏联是威胁整个欧洲的危险，“現时不宜于承認”苏联。

共产党人虽指出了这种政策的危害性，但是没有收到效果。1931年4月28日，克利門特·哥特瓦尔德在议会中发言說：

“……从进行反苏斗争的立場来看，在欧洲的、全世界的和

整个資本主义的政策中，德国比捷克斯洛伐克显得更为重要。理論上可以設想出这种局面：为了使德国更进一步加入这条战綫，就会付出使捷克民族受到直接威胁的某种代价作为补偿。这样，貝奈斯先生特別在社会民主党的贊助下所奉行的政策，这种建立在法国领导权的基础上、以結成所有資本家反苏統一战綫为目的的政策，它所引起的后果也会使捷克民族的独立受到威胁。因此，这不是什么保障捷克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政策，相反，这是一种其結果将会导致新的白山战役的政策”。^①

經濟危机在捷克斯洛伐克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它比大部份其他資本主义国家都更为持久和更为深刻。1933年生产才降到最低点，相当于1929年水平的60.2%。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所具备的相当可观的生产能力和国内市場上十分有限的购买力之間长期存在着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克服的矛盾所造成的。危机期間国外市場的大大縮小也給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带来非常严重的打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出口的工业部門（如紡織工业和木材工业）中，生产于1929年即开始下降。逐渐地重工业生产也开始縮減。193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十座高炉中，只剩下五座在繼續生产。鑄鋼生产減少了三分之二。玻璃工业生产下降了48.6%（同1929年比較），紡織工业生产則相当于1927年最高水平的59.7%。到1933年有三百十二个紡織企业停工，其他紡織工厂的生产也受到了限制。

捷克斯洛伐克慢性的农业危机也增加了，經濟危机的深度和持續性，农产品价格異乎寻常的暴跌，是农业危机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它跌落了40—60%。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小农。农业品跌价是由于

① 《哥特瓦尔德全集》，1951年捷文版第3卷第20頁。

城乡劳动者的失业和貧困而引起的食品消費量大大縮減的結果。农业投資猝然下降。本来即已不大的化肥消費量又減少了一半。用于农业机械、設備的开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工业品和农业品之間的价格悬殊状况不断加深。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是：每公頃农业土地的純貨幣收入急剧減少了。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貿易的慘敗，是經濟危机的另一个表現。193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額仅相当于1928年的四分之一強。力量較强大、技术較发达的德国把捷克資產階級排挤出它的傳統市場之外，因此捷克資產階級只好向获利較少的新市場擴張了。

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烏克蘭受到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这首先表現在危机爆发前就很薄弱的重工业上，例如，鉄矿开采量下降了80%。对斯洛伐克十分重要的木材工业也衰落下来。这样，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生产中所佔的比重在經濟危机期間更加縮小了。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之間的經濟不平等进一步加深了。

在資產階級执政十五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处于危險状况。生产大大低于战前水平。資產階級像以往那样，力图将危机引起的困难轉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这在最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严重恶化上表現出来。

工人階級受到失业的残酷折磨。即使按照官方統計来看，1929年以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1933年2月竟达到了惊人的数字——92万人。但是，在职业介紹所中登記的人数在捷克仅佔失业总人数的61%，在斯洛伐克甚至只佔失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实际上，失业人数估計达一百三十万人之多。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此外，还根本没有包括半失业者在內，虽然大部分工厂在一星期里只有部分時間开工。以紡織工业为例，1933年平均

每週只开工三天。

1930年官方登記的失业者中还有一半人获得了按照根特制度給予的失业津貼，但是到了1933年，就只有三分之一的失业者能得到这种津貼了。一部分其余失业者偶而得到他們恰当地称之为討乞証的价值为10克朗或20克朗的一星期口粮証。

失业对于工人說来不仅意味着失去了生計，同时还意味着由于几个月甚至常常几年的被迫閒居而荒疏了手艺，失去了工作技能。失业的不断威胁使工人深深感到生活不稳定的痛苦和对未来产生的恐惧，使企业主能更容易地压低工人的工資。

在危机时期中資本家宁愿雇用女工，因为比起男工來說女工是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这样，妇女往往成了維持一家生活的唯一贍养者。在危机初期，女工已約佔工厂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在紡織工业部門里則几乎佔三分之二。

降低工資是使无产階級貧困化的另一个手段。連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也估計到危机期間工人由于工資降低而受的損失达三百亿克朗，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受的損失达二百亿克朗；因而他們得出結論說，这样大的一笔錢足夠建造一个像布拉格那样大的、拥有最現代設備的城市。

危机結束时（1935年），三分之二享受保險的工人的日工資都在十八克朗以下。半数以上女工人的日工資在十克朗以下。由于食品和其他产品价格的減低要比工資的減低慢得多，因而实际工資大大降低了。某些食品的价格，例如糖的价格在危机期間就根本沒有降低。失业現象以及名义工資和实际工資的降低，表現为基本食品消費量的显著下降。即据官方統計数字，肉的消費量也減少了13%，油脂24%，糖11%，紡織品的消費量減少了23%。

經濟危机也严重地打击了小农和一部分中农。当农业资产阶级依靠各种各样的阴谋詭計获得巨額收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小农户却在危机期間破产了。土地佔有面积在五公頃以下的农户，平均每公頃土地負債达三千三百八十一—四千五百克朗。小农家庭的消費量在危机前就只等于地主家庭的五分之一至七分之一，而在危机时期又縮減了35—40%。但是，无论忍飢挨餓或更为辛苦地劳动都无法拯救农民。由于負債、破产而官方强制沒收或拍賣財產的案件迅速增加，1932年和1933年就达一百七十五万次之多。在危机年代里，这种强制执行的案件次比十九世紀整个下半叶的总数还要多。强制执行官在乡村中成了令人望之生畏的人物。

在城市中，許多小商人、手工业者和手工艺工人破产了，他們首先受到工人家庭消費量縮減的影响。危机加速了城市中等阶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危机无情地折磨着青年工人，使他們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几十万青年失业工人没有获得任何补助的权利、忍飢挨餓地勉强渡日。几万名中學生和大学生在毕业后找不到职业。

参加“工程师协会”的八千名会员中，就有二千五百人没有工作。經濟危机尤其残酷地压在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头上。斯洛伐克工人的工資比捷克工人的工資降低得还要多。半数以上享受保险的斯洛伐克工人日工資都在十克朗以下，斯洛伐克每人每年糖的消費量縮減到12.8公斤，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甚至縮減到5.7公斤，而全国的平均消費量却是21.8公斤。

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斯洛伐克大部地区、捷克地区內工业十分集中的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到处籠罩着可怕的貧困和飢餓。资本主义損害了民族的健康，从而威胁着民族的未来。

危机增加了資本的积聚和集中程度。1933年卡特尔法和銀行法的頒布，加强了壟斷資本的权力。这些法律实际上意味着强迫当时那些站在壟斷組織之外的企业参加卡特尔。右派社会党人把国家为最大壟斷組織的利益而实行的这一措施說成是实行社会主义經濟組織的一个重要步驟。

当小农和小手工艺工人由于交不起捐稅而被强制没收或拍卖财产的时候，国家却每年註銷了大銀行的几亿克朗的債務，並給它們提供了巨大的補助。

在危机时期中最大的康采恩組織、工商銀行、农业銀行和安路魯銀行彼此之間进行了日益激烈的竞争。它們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也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国内外政治路綫及其变化。

財政資本在危机期間通过1929年10月议会选举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实现了自己的統治。原来由捷克、斯洛伐克和日尔曼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組成的政府中，增加了几名右翼社会党的部長。日尔曼族社会民主党也第一次加入了政府。过去处在反对党地位的改良主义政党，現在从暗地里支持資產階級的政策轉而直接参加被共产党人称之为“飢餓和恐怖政府”的新政府。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在他們1930年9月于布拉格召开的第十六次大会上通过的，純粹是非馬克思主义的新綱領中，也企图为自己的这一政策辯护。他們硬說，在这期間无论工人階級或資產階級都不能单独統治国家，因而社会民主党有必要在政府中同資產階級政党进行合作。新政府的領導力量仍是“總統府派”。这一派的路綫和对人民施加思想影响的手段在这期間也最能符合財政資本的要求。“總統府派”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比其他国家开始較晚这一事实，散佈了捷克斯洛伐克是危机风浪中的一个“宁静和秩序井然的小島”的幻想。后来，当危机在捷克斯洛伐克全面地爆发之

后，他們又提出欺騙性的“同舟共濟”的口號。他們斷言，危機要求各個階級作同樣的犧牲。

“總統府派”用民族主義的和“民主的”陳詞濫調掩蓋了它在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方面——在執行無情地壓低廣大群眾生活水平的政策中和法西斯化政策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捷共把逐步限制和剝奪人民的民主自由、違背資產階級民主憲法、損害議會權利和用所謂“民主”的國家機器對革命運動進行粗暴迫害的過程，稱之為法西斯化的過程。法西斯化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發展中的、為公開過渡到法西斯主義準備條件的一個階段。捷共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把右派社會黨領導人積極參與法西斯化政策的這種行動稱為社會法西斯主義。捷共正確地強調指出，——而德國的局勢發展也證明了——右翼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所採取的態度便利了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後來，共產黨人拋棄了“社會法西斯主義”這個名詞，因為它會增加利用資產階級陣營內部矛盾的困難，它同忽略右派領導人和普通工人之間的區別的“左”傾觀點有關係，從而，妨礙了爭取社會民主黨的普通黨員採取一致行動的工作。

由於“總統府派”和改良主義者的影響在危機期間縮小了，同時由於資產階級陣營內部的矛盾尖銳化起來，財政資本便將法西斯組織作為它的後備力量。法西斯主義份子代表著最殘暴的財政寡頭集團的利益，企圖以法西斯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民主。捷克法西斯份子從危機一開始起就在前任民族社會主義黨的部長斯特里伯爾尼的領導下積極活動起來。他們企圖通過民族主義的叫囂來擴大自己當時的較小的影響。“斯特里伯爾尼聯盟”同蓋依達的法西斯主義的“民族聯盟”以及反動的克拉馬什的民族民主黨一起，在1929年的選舉中共獲得了不到9%的捷克人投的選票，其中以在布拉格得到的選票為最多。

在斯洛伐克，赫林卡的斯洛伐克人民党有着較大的影响。但是，法西斯份子以在日尔曼居民中的影响为最大。国家社会党和沙文主义的日尔曼民族主义党在1929年的选举中即已获得了日尔曼人所投的选票的1/4以上。

直到經濟危机末期，法西斯政党同各执政党——主要是农民党——内的法西斯派系才在资产阶级的計劃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危机的第一阶段，法西斯分子的任务是，通过极端的沙文主义、“反对总统府派的斗争”以及其他煽动性的手腕来轉移劳动人民的視線，使之看不到使他們陷入貧困真正原因，將他們引导到民族主义的道路上去，从而阻止他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經濟危机深刻地动搖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外矛盾尖銳化起来，並加深了它的总危机。在許多国家里开始出现了政治危机的跡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清洗了叛徒和脱离革命的人之后，站在劳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前列，为完成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而坚决奋斗。

二 捷共在坚决面向群众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极端左傾傾向的克服和反对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党在为执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总路綫而斗争的初期阶段是十分困难的。在取消派进行阴谋活动以后，許多党组织都遭到了破坏，必須把它們重新建立起来。1930年上半年，党员人数在二万一千——三万人之間。党沒有經費，通过最大的努力才維持党报的出版。

捷共遭到警察最兇殘的恐怖手段的迫害。對書記處和黨員住宅的搜查日有所聞。數十名革命路線最忠誠的擁護者被逮捕。共產黨報刊一概禁止在報攤和車站零售處出售。

必須對黨無比熱愛、對革命運動抱有忘我精神和忠心耿耿並對蘇聯和工人階級事業絕對忠誠，才能克服這些巨大的困難。

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的報刊天天妄想埋葬黨，為黨的消滅和瓦解而興高采烈。

但是，黨在戰鬥着。

1929年夏季和秋季，捷共領導了一連串規模較小的罷工。為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二周年，黨組織工人舉行政治罷工、示威遊行、集會和演說，參加這些活動的工人比參加8月1日反戰運動的還多。同時，運動還深入到工廠中去，其中也包括社會民主黨的堡壘——皮爾森什科達工廠。

1929年10月在莫斯特地區爆發了礦工反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合理化、反對工廠中的恐怖手段和為增加工資而進行的自發罷工。儘管罷工原來是以經濟要求為主，但它很快地便具有了鮮明的政治性。罷工顯示了礦工偉大的鬥爭決心。其缺點在於黨的工廠基層組織和紅色工會沒有進行充分的組織準備，直到宣佈罷工以後才爭取站在鬥爭的前列。在鬥爭過程中，捷共在相當大一部分未參加工會組織的以及參加改良主義工會的工人當中贏得了影響，並且不顧兇兵的大規模迫害、恫吓和改良主義領袖破壞罷工的行為，領導這些工人進行了反對礦主和反對國家權力的鬥爭。

礦工的罷工證明了集合在艾夫仁·弗里德周圍某些黨的幹部身上過去即已表現出來的“左”傾觀點的危害性。由艾·弗里德代表黨參加的罷工領導，未能克服罷工的主要缺點——分散性。弗里德不去制

止自发性，而却去为自发性辩护。他用所謂“不断罢工”的理論来作为自发性的根据，按照这个理論，矿区中各厂矿的工人不必同时罢工，而可以轮流地参加或退出罢工。分散性削弱了工人的斗争声势，使资产阶级有了迴旋余地。除此以外，罢工领导没有及时地、有组织地結束罢工。它向共产党员作了佈置：即使在其他矿工复工时，也要继续罢工。这就使共产党员在其他矿工中孤立起来，从而削弱了他們的影响。罢工以失敗而告結束。

弗里德集团的极端“左”傾的、宗派主义的傾向也表現在党的其他工作中。这个集团的追隨者企图主要进行政治斗争，而不管工人群众是否已有了充分准备。弗里德集团没有看到党的新领导在为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捷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总路綫而进行的斗争中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們錯誤地把某些缺点的原因看作是由党的整个路綫的机会主义錯誤所引起的；他們不懂得，发生这些缺点的原因首先在于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它在党组织内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根除掉，而只能通过系統的耐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們把“总清洗”，即将过去没有积极地做党的工作的全部党员和干部开除出党，看做是糾正錯誤的途徑。这是想用机械的组织措施来代替在党内进行系統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宗派主义嘗試。总清洗只能大大削弱党，使党失去了一部分忠于党的干部。它会妨碍党的巩固的过程，会使捷共为争取在不断发展的群众斗争中起领导作用而作的努力陷于瘫痪。

极端“左”傾傾向的錯誤玷辱了真正的革命路綫，降低了党的领导在党内的威信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凡是这种錯誤表現得較为严重的地方，例如在皮尔森州和斯洛伐克，党的组织都削弱了，並且暂时失去了一批忠实的工人干部。